

· 历史学研究 ·

“洛阳—平城”两都格局与北魏政权之败亡

崔彦华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 随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平城时代结束,洛阳时代开启,从此北魏历史上“洛阳—平城”两都格局正式形成。迁都后的洛阳新政盲目追求“文治”而忽略“武功”,使得素为用武之地的平城逐渐被摒弃于汉化之外,这些依旧保持着鲜卑旧有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平城力量借六镇为乱之契机,将北魏政权推入了灭亡的深渊,立国百年的北魏政府很快在以平城为中心的恒朔势力的打击下土崩瓦解。

关键词: 平城; 洛阳; 两都格局; 北魏灭亡

中图分类号: K23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35(2012)04-0070-06

从公元398年道武帝将都城从盛乐迁到平城后,平城就从两汉时期抵御北方民族的塞北一县成为北魏王朝的首都。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平城被尊为“北京”、“北都”,形成北魏洛阳时代的“洛阳—平城”两都格局。

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帝进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使魏晋以来号为“荒土”的洛阳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南梁名将陈庆之目睹洛阳的巨大变化后,由衷地慨叹:“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事实证明,北魏孝文帝通过迁都洛阳这一举措,实现了其“光宅中原”、“复礼万国”的目标。

为消除北方平城保守势力对改革的影响,孝文帝在诸多改革政策中,对北方鲜卑勋贵已采取了不妥协措施。但改革依然引起平城势力的极大不满,甚至不惜以身反抗,试图举兵断关、跨踞恒朔乃至规据陜北,重新建立一个与洛阳政权相对峙的平城政权,最终导致拓跋鲜卑内部的分裂。可以说,陪都平城对新都洛阳的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最终导致了北魏政权的覆亡。

一 迁都后对平城势力的妥协

北魏政府定都平城已有百年之久,鲜卑勋贵、代

乡旧族力量雄厚,贸然迁都,必然引起他们激烈反对。因此在迁都洛阳问题上,孝文帝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不仅采取“外示南讨,意在谋迁”的手段,甚至在宣布迁都之后,尽管洛阳一片废墟,孝文帝宁肯暂时停留邺城也不返回平城。大臣韩显宗上书恳请孝文帝“舆驾早还北京(平城),以省诸州供帐之费,并功专力,以营洛邑”^{[1]1338}的建议也被孝文帝断然拒绝。孝文帝并非不知居留邺城会有诸多不便,但在迁都洛阳未成定局的情况下,孝文帝担心一旦回到平城,势必会受到代乡旧族的影响,从而动摇迁都计划的实施。《资治通鉴》中胡三省对此注曰:“不肯归北,盖虑北人归代复恋土重迁也。”^{[2]4340}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继续采取许多措施,力图缓和平城势力对迁都的抵制情绪。

(一) 留台的设置

为稳定平城秩序,孝文帝在陪都平城设置了留台,专门有留守大官负责平城的各项事宜。在孝文帝以前,北魏政府尚无留台之职,所以胡三省注曰:“后魏孝文帝南伐,以太尉丞、广陵王羽留守京师,留守之制因此。”^{[2]4335}孝文帝为了确保陪都平城的稳定,特别新设留台,派镇南将军于烈全权负责平城留台事宜。事实证明,孝文帝这一举措是非常必要而且正确的,在之后的代北诸贵叛乱中,陪都平城的鲜卑勋贵,大都参与了此次叛乱,只有于烈一宗,没

收稿日期:2011-12-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南北朝时期的平城、太原与欧亚大陆”(08BZS009);山西大学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魏晋南北朝陪都研究”(1009019)。

作者简介:崔彦华(1977-),女,山西祁县人,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中国社会史(隋唐以前)的研究。

有卷入其中。

孝文帝在平城设置留台的具体机构,因史料记载缺乏,已不能确知,但就仅有的史料来看,设有留台令、仆是没有问题的。在太和十九年(495)太师冯熙病逝之后,留守陪都平城的代乡诸贵以请孝文帝奔丧为由,妄图诱引孝文帝回到平城。孝文帝洞悉了他们的阴谋,下令将平城留台令、仆以下诸官,全部交由御史贬官处理^①。可见,迁都洛阳初期在陪都平城留台之下的官吏较多。

(二) 在一些具体制度的制定上对平城势力的妥协

后世学者对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成就,高度赞赏者有之,如北宋学者欧阳修就认为:“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3]284} 颇不赞同者也不在少数,清代学者王夫之就提出尖锐的批评:“自迁洛以来,涂饰虚伪,始于儒,滥于释,皆所谓沐猴而冠者也。”^{[4]576} 王氏的评论,尽管有些偏激,但不可否认的是: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并不非常彻底,在改革实施过程中,对平城势力在很多方面都采取了妥协的态度。

首先,“冬夏二居”措施的推行。

北方少数民族惧怕炎热,对中原气候很不适应,北魏初期统治者在初踏中原时,就经常在六月酷暑前往“阴山却霜”^②,以躲避暑热。而新都洛阳位于中原腹地,较之北都平城,气候更是炎热,这成为鲜卑勋贵反对孝文帝迁都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孝文帝为“和合众情”,缓解代京旧贵对迁都洛阳的抵制情绪,允许他们“冬夏二居”,时人号之曰“雁臣”。北魏许多代京旧贵及领民酋长,均是“雁臣”中一员。如北魏重臣斛律金,“魏除为第二领人酋长,秋朝京师,春还部落,号曰雁臣”^{[1]1965};世居秀荣川的尔朱氏,“及迁洛后,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1]1644};库狄干,“以家在寒乡,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师,夏归乡里”^{[5]1956}。库狄干被授将军,是在孝文帝正光年间,此时上距孝文帝迁都已近30年之久,然而这些“雁臣”仍不辞辛苦,长距离奔波于平城和

洛阳之间,可见陪都平城对他们的吸引力要远大于新都洛阳,只是由于北魏皇统在洛,这些人才不得不奔波于京师和平城之间。甚至到世宗宣武帝时期,洛阳朝廷中仍有很多大臣提出北还平城的建议,以至在朝廷中都引起骚动。史载:“世宗颇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还北之问,至乃榜卖田宅,不安其居。”^{[1]378} 而元晖在劝阻世宗时也明确提到:“先皇移都,为百姓恋土,故发冬夏二居之诏,权宁物意耳。乃是当时之言,实非先皇深意。”^{[1]378} 可见冬夏二居实非孝文帝本意,乃是当时情势使然的无奈之举。到孝明帝时期,鉴于北人还代的现状,又下诏:“北京根旧,帝业所基,南迁二纪,犹有留住。怀本乐故,未能自遣,若未迁者,悉可听其仍停,安堵永业。”^{[1]226} 从国家层面上正式承认其居留平城的合法地位。

其次,在一些具体政策的制定上,孝文帝也充分考虑到了代京旧贵的实际情况。

如禁鲜卑语。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先正名”在太和十九年(495)六月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1]177} 这条政策,看似严厉,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仍是有所折扣的。《魏书·咸阳王禧传》载:“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从上可见,禁鲜卑语这条政策,主要是针对在朝诸官而规定的,并且将年龄放宽到三十岁以下。而对于不在朝廷之人、或虽在朝廷但年纪在三十岁以上的代京旧贵,则不在禁止之内。正是由于规定上的不严格,许多鲜卑勋贵或对这项政策阳奉阴违,甚至公开抵制。孝文帝禁鲜卑语的政策,本意是想通过消除拓跋鲜卑族和汉族在语言上的隔阂从而达到其汉化的最终目的,但可惜的是推行并不彻底,在新都洛阳尚且如此,代都平城鲜卑语流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改革胡服。鲜卑部起自塞外,其俗披发左衽,与魏晋以来中原传统服饰有很大的不同,孝文帝因此下令进行服饰改革。但从史书所载来看,此项改革同禁胡语的

① 《资治通鉴》卷140《齐纪六》明元帝建武二年(495)载:“今经始洛邑,岂宜妄相诱引,陷君不义!令、仆以下,可付法官贬之。”胡三省注曰:“此平城留台令、仆也。”第4381页。

② 《宋书》卷95《索虏传》载:“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众至阴山,谓之却霜。阴山去平城六百里,深远饶树木,霜雪未尝释,盖欲以暖气却寒也。”第2322页。另《资治通鉴》卷110《晋纪三十二》安帝隆安二年(398)载:“魏之旧俗,孟夏祀天及东庙,季夏帅众却霜于阴山。”第3484页。

改革一样,仍是遭到了代京旧贵的抵制的。史载:“魏主欲变易旧风,壬寅,诏禁士民胡服。国人多不悦。”胡三省注曰:“国人者,与魏同起于北荒之子孙也。”^{[2]4370}由此可见,所谓国人,主要是居于代京平城之勋贵,由于“国人”的不悦,这项法令依然贯彻得并不彻底。

另有死后安葬的问题。年老返乡和死后归葬是我国长期以来乡里观念的直接反映,即使是在魏晋时期政局动荡局势下,归葬故乡的观念依然非常强烈。拓跋鲜卑创立的北魏政权起自草原,初期并没有什么乡里观念,但自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之后,以代郡平城为中心的地区,遂成为他们故乡所在,这些鲜卑勋贵死后也大都埋葬于此。但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归葬平城和近葬洛阳成为摆在代京旧贵面前的一道难题,为巩固洛阳新政,孝文帝自己率先放弃了在平城已经修建好的寿宫“万寿堂”,重新在洛阳北邙山为自己营建长陵,并于太和十九年亲自下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迁洛者悉为河南洛阳人。”^{[1]178}但这道诏令的下达,本身说明当时迁洛的代郡平城人在死后依然选择不远千里归葬平城这种方式,而且这种现象应该是较为普遍的,以致引起了当政者的注意。为了尽可能斩断迁洛之民与代北的联系,不使迁居洛阳之人复生恋北之心,孝文帝不得不用国家意志来禁止归葬平城的行为。但就在这个“死葬河南”的问题上,执行过程中也采取了折中的办法,《魏书》对此事有较详细的记载:

有司奏,广川王妃薨于代京,未审以新尊从于卑旧,为宜卑旧来就新尊。诏曰:“迁洛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邙岭,皆不得就茔恒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妇今丧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坟于恒代,夫死于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从之。若异葬亦从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丧,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户属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从所择。其属诸州者,各得任意。”^{[1]527}

也就是说,孝文帝“死葬河南”的这条诏令,主要是针对旧都平城地区的“代人”而言的,对于其他

诸州人士,则采取了“各得任意”、“自听从便”的态度。但即使是这样,这条诏令在民间也未被严格执行。有的平城旧贵为了死后葬在北方,甚至采取拒绝入洛为官的极端办法。如元叉继弟罗侯,在“迁洛之际,以坟陵在北,遂家于燕州之昌平郡。内丰资产,唯以意得为适,不入京师。”^{[1]409}尤其是在北魏后期,孝文帝死葬河南的诏令形同虚设,许多代北人士在死后纷纷归葬家乡。1981年在大同城西发现北魏墓葬,墓主人封和突^①,代郡平城人,曾任洛阳刺史,说明其是代迁洛阳之人。景明二年(501)正月薨于官,也就是说封和突是死在河南的,但其墓葬却在平城发现,可见封和突死后还是被运回平城安葬。景明二年乃宣武帝当政期间,上距孝文帝颁布“死葬河南”令仅仅过了六年时间。宣武帝期间,另有元淑、高琨^②等,皆北魏宗室国戚,但死后都葬于陪都平城,可见陪都平城对他们的吸引力要远大于洛阳,同时也说明孝文帝“死葬河南”的诏令在实际执行中并不彻底。

二 平城势力的叛乱

在迁都洛阳的问题上,遭到了代京旧贵的极力反抗。对于大部分鲜卑勋贵来说,“自建邑平城以来,与天地并固,日月齐明”^{[1]359},定都已近百年的平城早已成为他们的根基所在,在这种情况下,迁都问题激化了北魏鲜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直接导致了拓跋鲜卑贵族分裂为洛阳和平城两大势力集团。正如南齐王融所预料的一样,迁都直接造成北魏内部“风土之思深,愆戾之情动,拂衣者连裾,抽锋者比镞,部落争于下,酋渠危于上”^{[6]819}的后果。

太和十八年(494)三月,孝文帝返回平城,与留守众官商讨迁都利害。留在代都的平城势力,从最初的“莫不惊骇”到此时的各抒己见,积极反对迁都洛阳。在反对无果的情形下,平城势力便纠结力量,伺机而动,意图胁迫孝文帝改变迁都洛阳的决定,而此时太师冯熙的病故给平城势力以绝佳的机会。以穆泰、元丕为首的平城势力便上书孝文帝回旧都为冯熙举哀,其实质是想挟持孝文帝,迫他收回成命。孝文帝洞悉了他们的阴谋,断然拒绝返回平城。

为防止内部分裂,孝文帝采取了既打击又安抚的办法:一方面将表请车驾还代的官吏按律处理,陆

① 参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4页。另见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

② 参见王银田《元淑墓志考释——附北魏高琨墓志小考》,《文物》1989年第8期。

勰就因此被免去都督三州诸军事的职务,同时又鉴于他们的实际情况,任命元丕为并州刺史,后又任命陆叡为都督恒朔二州诸军事,并给以“有顺迁之表,加邑四百户”^{[1]1913}的奖赏。通过这些措施,满足他们恋旧的心理,同时予以经济安抚,以缓解他们对迁都洛阳的抵抗心理。但孝文帝的妥协并未取得平城势力的谅解和支持,太和二十年(496)八月太子元恂的北奔事件,表明孝文帝妥协政策的彻底失败。

元恂是孝文帝的长子,但对于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举措,作为皇子的元恂,并不能认同,史载其“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1]588},元恂所追乐的“北方”,正是陪都平城。太和二十年八月,太子元恂趁孝文帝幸嵩岳、自己留守洛阳的机会,试图“召牧马轻骑奔代”。尽管元恂的叛乱历时很短,甚至连洛阳宫门都未出就宣告夭折,但他的“轻骑奔代”,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受到代京旧贵招诱的结果。

如前所述,孝文帝为提高太子元恂的地位,如遇自己出征,常让元恂留守,主持朝政一切事宜。太和十八年孝文帝发起南伐时,太子拓跋恂应该是留守平城的^①。代京旧贵在和平抵制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转而采取“拟举诸王”、招诱宗室以武力反抗的办法,而“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的太子元恂就成为他们招诱的最佳目标。正是在代父留守平城期间,太子拓跋恂与代京旧贵达成了某种默契。《魏书·东阳王丕传》载:“高祖之发平城,太子恂留于旧京,及将还洛,隆与超等密谋留恂,因举兵断关,规据陞北。”

元恂出奔的目的,孝文帝是非常清楚的,“今恂欲违父背尊,跨据恒朔。天下未有无父国,何其包藏,心与身俱。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脱待我无后,恐有永嘉之乱”^{[1]588}。可见,“忌河洛暑热”只是元恂北奔的表面原因,联合代京旧贵,最终“跨据恒朔”、分国而治才是其真实目的。

太子元恂的北奔事件,不仅造成孝文帝本人家庭的悲剧,同时直接促成了北魏统治集团内部彻底分裂,代京旧贵不得不殊死一搏,正式和洛阳势力举兵相向,走上了武力反抗迁都的道路。

在元恂被废后,以穆泰、陆叡为首的代京旧贵就

公然举兵反抗孝文帝的洛阳朝廷,企图在陪都平城另立朝廷。穆泰,本北魏名臣穆崇之后,历任要职。穆泰本应是孝文帝坚定的支持者,在代都平城时,文明皇太后曾经意图以咸阳王禧取代孝文帝,正是由于穆泰的强烈劝阻才打消了这个想法^②,孝文帝因此对穆泰“赐以山河,宠待隆至”^{[1]663},亲自赐名为“泰”。但在迁都问题上,穆泰却非常顽固,乃至最终与孝文帝兵戈相向。另有陆叡、元丕等人,都是朝中重臣,“早蒙宠禄,位极人臣”^{[1]913}。而正是这些被孝文帝非常宠幸、委以重任的代京旧贵,最终诉诸武力,其根本目的,正如孝文帝对任城王元澄所言:“穆泰谋为不轨,招诱宗室。脱或必然,迁京甫尔,北人恋旧,南北纷扰,朕洛阳不立也。”^{[1]468}就是反对孝文帝的迁都之举,意图使孝文帝洛阳政权不稳,最终将都城重新迁回平城。陆叡、穆泰等的招诱宗室,在太子拓跋恂北奔宣告失败之后,转而招引其他北魏宗室,《魏书·陆叡传》对此有详细记载:

时穆泰为定州刺史,辞以疾病,土温则甚,请恒州自效,高祖许之。乃以叡为散骑常侍、定州刺史,将军如故。叡未发,遂与泰等同谋构逆。……诏仆射李冲、领军将军于烈曰:“陆叡、元丕,早蒙宠禄,位极人臣。自与卿等同受非常之诏,朕许以不死之旨,思得上下齐信,以保大义。朕于卿等常忘短弃瑕,务相含养。岂谓陆叡无心之甚,一至于斯。乃与穆泰结祸,数图反噬。以朕迁洛,内怀不可,拟举诸王,议引子恂。若斯之论,前后非一。始欲推故南安王,次推阳平王,若不肯从,欲逼乐陵王。讪谤朝廷,书信炳然。事既垂就,叡以洛都休明,劝令小缓,于是之后,两人复竞。然犹隐而弗闻。”

从上述史料可知,以穆泰、陆叡为主的反叛,酝酿时间很长,在招引太子元恂失败之后,又意图招引南安王元桢、阳平王元颐以及乐陵王思誉,前后几次三番,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穆泰等人的这次叛乱,波及范围之广在北魏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太子元恂,因之被赐死;南安王元桢,“知而不告,虽薨,犹追夺爵封”^{[1]495},落得人死国除的下场;乐陵王

① 关于此时太子拓跋恂是否留守平城,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载:太和十八年春正月孝文帝朝群臣于邺宫,后车驾南巡,接着幸洛阳西宫后开始北巡。闰二月癸亥,到达句注陞南,此时皇太子恂朝于蒲池。壬申,孝文帝和太子恂到达平城宫,由此推知,太子拓跋恂此时应该是在平城留守。

② 《魏书》卷27《穆泰传》载:“初,文明太后幽高祖于别室,将谋废黜,泰切谏乃止。”第663页。

思誉,本孝文帝叔父,孝文帝因“恒代路悬,旧都意重”^{[1]516}在迁都之初,专门派其转镇北方,以稳定代京局势。但穆泰谋反,思誉却也是知而不告,因此被削为庶人。其他如安乐侯元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也都参与了此次叛乱,“是逆也,代乡旧族,同恶者多”^{[1]738}。可见,北魏政权中大量的拓跋宗室或直接参与或暗中支持或坐观其成,都是反对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其他参与或被牵涉的人员,更是不在少数。

在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穆泰、陆叡等人的反抗很快就被孝文帝派出的军队分化、瓦解及至最后消灭,成为代京旧贵武力反抗孝文帝迁都最后的千古绝唱。平城势力反抗迁都之举也从此转入地下,重新酝酿力量,最终在几十年后由起自六镇的平城力量敲响了北魏政权的丧钟。

三 陪都平城与北魏政权覆灭的关系

孝文帝迁都洛阳,主要是为了实现其光宅中原的理想,孝文帝临死之前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庶南荡瓠吴,复礼万国,以仰光七庙,俯济苍生”^{[1]185},而迁都洛阳,定鼎河洛就是其复礼万国的手段和方式。

但孝文帝也深知,平城立都百年,在此推行禁胡服、断北语、改族姓等一系列汉化措施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如果要把这些汉化措施深化下去,也必然要斩断新都洛阳和旧都平城的联系,因此平城地位的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对孝文帝来说,平城或许是其心中不愿碰触之地,幼年冯太后强权的压制、多次几乎被废的危机、父亲献文帝被鸩杀的恐惧以及亲政后皇权的尴尬,不可能不在孝文帝心中留下阴影。因此,尽管迁都洛阳后的平城依旧保持了“北京”、“北都”的称号,但也只是一个表象而已,之后孝文帝很快就改洛州为司州,而将自道武帝天兴年间在平城设置的司州改为恒州,原首都平城成为恒州下辖代郡的一个属县。针对这种设置,中书侍郎韩显宗提出了不同意见,《资治通鉴》载韩显宗上书曰:

又昔周居洛邑,犹存宗周;汉迁东都,京兆置尹。察春秋之义,有宗庙曰都,无曰邑,况代京,宗庙山陵所託,王业所基,其为神乡福地,实亦远矣,今便同之郡国,臣窃为不安。谓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旧,光示万叶。^{[2]4350}

在这份奏章中,韩显宗追溯了西周、东汉两都制度,希望孝文帝上遵前朝古制,下依本朝旧例,注重

陪都平城的战略地位。韩显宗都意识到这个问题,英明如孝文帝是不可能不知道平城的利害关系的,孝文帝自己就曾在“迁都洛阳大赦诏”中,将陪都盛乐和平城比作西周历史上的都城丰、镐,“暨昭成建国,渐堵盛乐,何异周父(文王)作邑乎丰。列祖道武皇帝,……且都玄代,渐畅声教,颇等姬武,宅是镐京”^{[7]275}。可见孝文帝是深晓旧都平城的重要性的,但依然没有采纳韩显宗的建议,个中缘由,或许是孝文帝所不能昭告于天下的。

另外,迁都洛阳后,太子元恂的单骑北奔,以及以平城为中心的恒朔势力的叛乱,使得孝文帝不能不对旧都平城有一定的防范。如果继续维持平城尊崇的地位,难免再有第二个穆泰、陆叡之流利用平城强大的号召力而“跨据恒朔”,与洛阳中央政府抗衡。因此,孝文帝在正式迁都洛阳后,就将原首都平城彻底放弃了。北魏在迁都洛阳后短短的三十多年之内,国势急转直下,最终导致北魏的覆亡,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后世学者在论及北魏王朝灭亡之祸时,都注意到平城弃守的影响:南宋叶适在其《习学记言》中多次指出北魏灭亡与平城弃守的直接关系,如“魏亡之祸,成于六镇;轻薄六镇,实自太和。夫变夷从夏,人孰不以为美?至一家门户紧切利害,乃忽弃不顾,可乎”;“孝文慨慕华风,力变夷俗,始迁洛邑,根本既虚,随即崩溃”^{[8]491},叶适所指根本,实际上就是旧都平城。而清代学者赵翼同样认为:“国势之衰,实始于此。”^{[9]209}

定都与迁都问题,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体现,往往预示着一国一朝政局的动荡与兴衰,或为中兴之肇始,或为丧邦之先兆。盘庚迁殷,走出了一条殷商王朝从动荡转向稳定的轨迹;孝文迁洛,则书写一曲北魏败亡的悲歌;之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虽开创了“天子守边”的都城佳话,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注定了明朝败亡的政局。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建都》篇中就明确指出:“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散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四 结语

北魏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短短三十年的时间内便很快衰亡,原因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北魏灭亡

与陪都平城的弃守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起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拓跋鲜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双中心格局，《魏书·官氏志》载：“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分为南部而、北部，复置两部大人以统摄之。”这种双中心格局，就是本文所言之首都、陪都的两都格局。从北魏逐渐脱离最初迁徙游牧的生活方式、开始有了较为固定的政治中心时，就“城盛乐为北都，修故平城为南都”，这一南一北两个中心，对鲜卑拓跋部所控扼的广大地区实行了有效的统治，道武帝拓跋珪正是以盛乐和平城这两个中心为基地，跃马弯弓，进入中原腹地进而建立北魏王朝。北魏平城时代诸帝对盛乐重视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以双中心格局对北魏政权实行有效的统治。

但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放弃了北魏立国初期以来的双中心政治格局，旧都平城虽然名义上被尊为“北都”、“北京”，但实际却被彻底摒弃在汉化圈子之外。而与北魏政治中心转移洛阳不同的是，北魏的军事中心，依然保持在以陪都平城为中心的恒朔地区。正如台湾学者康乐所言：“当都城在平城时，帝国的军事政治力量是合一而集中在长城边疆的。都城南迁，政治中心移到黄河流域，军事力量——北亚游牧民族——则大半仍留在长城边疆，控御遂出

现问题”^{[10]205}。

导致北魏最终灭亡的力量，不是来自外部的势力，也不是来自与其他民族的矛盾，恰恰是来自陪都平城、曾是鲜卑国家政权最坚实的军事支柱的北方军镇集团，最终颠覆了北魏政权。北魏政权的灭亡固然有诸多因素，但忽视陪都平城，以致“根本”既失，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

参考文献：

- [1] [北齐]魏 收. 魏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 [北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3] [北宋]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4] [清]王夫之. 读通鉴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5] [唐]李延寿. 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6] [梁]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 [7] [唐]许敬宗编, 罗国威整理.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8] [南宋]叶 适. 习学记言序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9] [清]赵 翼. 廿二史札记[M]. 南京: 凤凰出版集团, 2008.
- [10] 康 乐. 从西郊南郊: 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M]. 中国台北: 稻禾出版社, 1995.

The Pattern of Dual Capitals of “Luoyang – Pingcheng” and the Fall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CUI Yan – hu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Emperor Xiaowen’s transfer of the capital to Luoyang marked the end of Pingcheng era and the beginning of Luoyang times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Since then, the pattern of dual capitals of “Luoyang – Pingcheng” formally form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However, the new administration of Luoyang pursued mainly “culture cultivation” and ignored “martial arts”, putting Pingcheng, the “martial arts” – featured place, out of Hanization. These forces which still kept up the old production methods and living customs of Xianbei pushed the Northern Wei regime into the abyss of doom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armed rebellion of six towns. Soo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of a hundred years history was subverted by Heng Shuo forces based in Pingcheng.

Key words: Pingcheng; Luoyang; the pattern of dual capitals; the fall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责任编辑 贾发义)